

马克思早期政论文章对学术写作规则的批评

张文喜

摘要 为一切哲学家、学者提供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启蒙和哲学的自由探究一直梦想却又无法实现的一个人权神话,其显见的原因之一是哲学和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理念冲突。体制也一直认为它的敌人就是观念和具有观念批判能力的人。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有关写作的规训是体制应对它的敌人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是对体制的批判。这一任务的主要思想包含在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论述里,也包含在对学术写作规则的批判里。马克思以“自由的自然规律”为出发点来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以此透过对思想语法、表达和写作潜规则的批判,将作者置于真理、言论自由者的地位。透过马克思对书报检查的批评,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马克思最富有哲学激情的作品是“政治的”。

关键词 马克思;书报检查制度;体制批判;学术写作规则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3-006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21AZX001)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各国宪法对言论自由作了一定的限制,各国政府基于避免危害社会的考虑、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限制公共讨论的自由。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同情理解宪法赋予政府审查持有或表达“危险性”言论的权力,我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定的信念也是按照这种作为规范某种政治意见利害形式的持久的原则进行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观点看来是与人自身的自由目的背道而驰的。是这样吗?当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在什么时候说就在什么时候说,是这样吗?当一名党员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在煽动还是在表达言论自由?纵观历史,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一直是一种实践的世界观察和世界认识的急迫需要。就是说,按照表达抽象的哲学理论的方式解释表达自由,攸关共同体利害,那是错误的,并且是对它的意义的歪曲。换句话说,如果将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念注定要被社会的大多数人接受,那么表达自由的准确含义就是现在必须给予这些信念表达的机会和传播途径。这种观念否定了人是世界的不参与的旁观者、总结者,或者否定了人本身是哲学概念。进而言之,一种哲学有可能导致革命行为,这一点并不可以拿来证明压制表达哲学自由探究的理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式的观念。这一判定体现的信念已经在马克思早期的政论文章中有了说明。

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新书报检查令,自由主义者一度感到欢欣鼓舞,以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时代即将来临,却压根儿不能够看清它的更加深重的危害,也没有感觉到政治迫害是其时代的一个历史处境问题。1842年3月,应赫斯之约,马克思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此,马克思对构成当前新闻出版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有着深刻批判,更进一步阐说,书报检查“不应该把哲学也牵连在内”^[1](P40)。究其根本,哲学是在法律社会面前辨明它存在的正当性。但毫无疑问这是体制不愿意承认的,与之相伴的就是一种政治迫害。当青年黑格尔派一部分成员选择通过远离政治来逃避现实时,马克思却拒绝这样做。这使马克思的处境更加不利。该文不能在德国发表,而只能在瑞士发

表,便是应验“政治乃是命运”这个格言的典型例证。

一、反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重要分量

在1842年,马克思冒着无法确定其写作计划能否完成的危险,冒着既不能落到书籍市场上、也不能通达读者手里的危险,冒着没有安全和被驱逐的危险,撰写了标题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又名《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集权问题》等6篇反对书报审查的政论文章,刊登在《莱茵报》上。从马克思的著述来看,无论是篇幅还是后世影响,这些政论文章显然都无法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媲美。这些文章大多是针对德国的时政,或者说,它们只是对普鲁士反动统治的报纸上的批评,它们只是反映了和它们所批评的时代的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但时过境迁,这种批评是否还有说服力呢?人们对此也许有疑虑,认为这些批评是依赖于既成的转瞬即逝的事实和德国的历史的状况,它们承担的任务不过是类似于一个记者或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这些作品对我们今天来说早已经死掉了,而一个持马克思早期思想不成熟论者,也许还会要求其他人重复这样的看法。

但是,马克思本人对《莱茵报》的政论文章是极其看重的,他曾言这些文章探讨的是他耿耿于怀的关于“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2](P171)。而笔者现在准备在本文中特意澄清马克思关于作者及其作品观,是为了提示我们必须从一个广阔视野出发,以便重新思考今天形势下的写作和有关的哲学观念。因为这些论文恰恰向我们表明的是马克思向作者提出要求的東西。他说,“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2](P192)。这是马克思对作者与作品关系的辩证论述,也是马克思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生产角度看,作者或作家是生产者,不是食利者,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关于作者的这种论述回溯到他与作者这项职志定位以及他以此勉力一生的紧密关系中。因为通过报界,至少通过《莱茵报》,我们可以认识到当代资产阶级的消遣作家或现代抄写者不会承认这种学术职志。马克思向我们证实,他作为作者可以为作品而思考,而忍受,而活着。为此他提出了关于作者的自主性问题:即他想写什么就有写什么的自由问题^[2](P110-111)。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英勇果敢但在当时却是不能不被孤立的观点。马克思深刻感受到当时欧洲的普遍精神危机。在革命议会化情势下,马克思迫切希望见到一场心灵对抗“精神统治”秩序的革命。

如果人们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些文章,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应该是求疵地指出此时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尚未“转变”成《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而是应该看到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从中可见马克思“真要讨论共产主义”^[3](P62)的端倪。奥·科尔纽曾说,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民主政治与封建专制政治之间的对抗是重大问题^[4](P252)。评价当时的马克思也就是衡量他给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思想家带来的激励,马克思自己明白这点:面对很久以来围绕书报检查进行的论争,人们不能仅用实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解决实现自由的矛盾,因为它没有摆脱那种无聊的所谓“一方面——另一方面”公式。一方面要求作者的作品有正确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有理由期望这些作品有学术质量。只要人们没有认识到倾向与质量、写作与自由这两层关系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矛盾,这个公式就是一个谎言。

马克思为此嘲讽说:“当我还少不更事时,我就知道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的蛋,而是鹅蛋。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是鳄鱼蛋……就是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开,因为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5](P25)当然,像毕洛夫-库梅洛夫那样的作家可以用他们的“笔杆卖弄自己的犁”,因为他们“有世俗地位”,“应当受到欢迎,特别是,如果将来犁能够代替笔来思想和写作,而笔又能以服劳役作为报答,那么他们就更应受到欢迎”^[5](P26)。问题就在这里:为谁写作?我当然倾向于我属的阶级,但这并不是说我写作只能局限于这个阶级。马克思倒是很想证明其反面,就是有哲学上的探究自由才能确保作品的学术质量。所以,马克思期待“各邦政府越是单一化,现今的哲学家们就越是多样化,但愿这支多

样化的大军能战胜单一化的大军”^[5](P26)。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就是由此出发展开他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学术写作批判。在此,它证明出版自由标志着人类经过决定性的心智努力才能获得解放。但可惜的是,现今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些批评的关键,也没有多少人会把马克思置于作者的崇高地位上,置于受迫害写作的观点上,置于在莱茵省议庭这个政治共同体面前辨明哲学或自由探究之正当性的精神来阅读这些作品的倾向上。一句话,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些文章呈现正确的政治倾向也必然呈现它崇高的学术质量。

二、本质的问题:思想语法和表达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的政论揭露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虚伪自由主义”本性,对人类心智体制化的弊病表明了淋漓尽致的批评态度。毫无疑问,这些文章不仅标记了马克思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辩护的思想主题,是马克思直接干预政治生活的记录,而且也表现着马克思分派给哲学之揭露思想假象的严肃任务。针对书报检查制度、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人类心智的成熟及其扩展方式,要在每个人的独立和自我负责的思想机制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些思想机制有其丰富复杂的思想语法(内容)或逻辑(形式)方面。在马克思那里,若思想语法符合实现自由、平等,首先会带来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其次,若写作是真正合乎理性的,那么每个人都要遵守“自然的自由规律”之思想表达,也应当自由使用语言。思想表达规则应当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专断的,应当是揭露真相的,而不是隐藏真相的。

当我们细细品味这些作品的自我批判精神时,马克思那“丰富和不知餍足”^[3](P48)的思想扑面而来。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争辩的立场仍然是一种类似黑格尔那样的客观精神,它们在突出马克思以民主主义为立场的政治辩论,而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解释。其本质理由是,马克思是一个对言论自由有深邃思索的作家,不管它显得多么革命,他必以某些令人信服的根据为批评原则,不然的话,就会授人以柄。例如,有些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马克思的这些作品没有连贯的、理性的理解,同成熟时期的作品比较起来,它们只有一种从公共传播的舆论批评(所谓德国的“公共性”或普遍“人权”)出发获得其自身价值的定位。但从这个看法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丝毫没有顾及这些作品在社会精神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马克思自己也不愿意仅仅把它们理解为对某种公共传播的舆论批评。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文章在其评估自身领域而产生的深度的同时赢得的广度。它们表明,在书报检查制度中,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学术才能,而是“够资格的作者”头脑中的技巧。因此,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就是以一种非学术写作的规则来阻碍哲学自由探究和科学真理公共传播的制度。但这些危及自由的审查规则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书报检查机关竟然到作者的内心去寻找答案。可实际上,当然不会是来自作者本人,相反,如马克思所知,它们来自“追究倾向的法律”的习惯承袭,来自对叙事的上千年的逻辑(所谓事物本身或自然法),来自意识形态维护者的政治决断,来自阶级意义上因抽象而不可定义的人类健康理智,或来自一种理性命令甚或神秘的指令。马克思认为,这些来源从整体上讲都是不合理的,当这种不合理性通过书报检查途径强加给普鲁士知识分子时,势必导致心灵或思想的僵死。

对于这种构成集体的充满压迫的有害规则,马克思的问题是,人们将如何改变它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假定,过去人们曾多次反复想过此事,但钳制思想自由的制度在过去一直存在。因此,作品不再具有个性色彩的呈现,而是以应付对书报检查机构为目的的一种耍弄特殊的写作技巧即所谓“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2](P219)写作。在这里值得期待的不是如封建专制者和自由主义者宣布的那种压制或强制精神革新,而是现代国家公民实际上享有公共讨论的自由。马克思看到,从压制到强制思想,其内容有所调整,但那把人类精神的钳子一直存在着。因为马克思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出版机器即使能够吸纳乃至宣传革命思想(如黑格尔的著作),但并不以此对它自身的存在和占有它的阶级存在真正提出批判和澄清。恰恰相反,这种机器是由墨守成规者提供和掌握的,因而是一次次地强加一种规则,合法化一种规则,最终使其成为一种任意压制言论和写作的国家机器的工具。因此,人们又谈何改变这

些规则呢?

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的这些文章说的就是:在威廉四世时期,出于时势所迫,即使会出现言论自由宽严程度不等的氛围,但此氛围的变化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这个问题本身应当由哲学的自由探讨才能回答。对此,马克思恰当地追问:“真理的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制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2](P110)但是,在书报检查令下,一副所谓“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的样子呈现出锱铢必较的法律规定,并把墨守成规者视为“够资格的作者”。而哲学呢?普鲁士国家只对它进行官方认可,使其屈从于宗教的监管之下。它们为了“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2](P219)而存在。同这种情形相关,哲学家每个人的精神个性都躲在自己的一角,如同法律去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时,一开始就躲避真理一样,“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2](P110)。

在此,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有些时候马克思要将政治现实在哲学框架内呈现出来,应该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哲学是“政治的”。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最合情合理的因素是“人世的智慧”,它“从一开始就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现世的王国——国家。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对国家进行哲学研究,而在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研究”^[2](P223)。也正因此,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不管是在威廉四世时代,还是在今天,它们都很好地表明了写作和自由的社会怎样关联在一起的主题。

在这里,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那样,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评也应当是以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流行规则为对象的批评。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的或伦理的审查,如认定这本是够资格的或不够资格的;好的或坏的;应该禁止的或应该出版的^[2](P193-195),在出版物的知识中是不存在根据的。因为知识和出版物一样是语言层面的,因此不能在它们自身之内被证实为真或假,唯有针对自由本身才能作出判断。所以,在这里本质问题有两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思想语法(它注重的是思想内容、质料逻辑)方面和表达(它注重的是规则、体裁、写作或思想形式等)方面。这两个方面恰好因为它们可能包含两种完全不同平面上的运作的逻辑,而相互拆台、相互对立。马克思告诉我们,在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是一种含糊其词的追索和“爱好宁静孤寂”的人;与此对比,一个仅有正常水平智商的书报检查官反倒显得比最聪明的哲学家更聪明一些。在检查官身上体现了熟练运用以形式代替内容的手法,这种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2](P109)。在普鲁士邦法中,书报检查官的职责犹如护林官,不是使树木变成了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法律被写出来,树木就总是变成人),而是人会变成树木或者某种匿名的东西。对此,通过规训和发号施令就能做到。马克思接着说,“这种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的做法真是最巧妙而又最简单不过了”^[2](P243)。

从这个主题来看,我们的时代在理智氛围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表现是,作者个人坐在桌前,敲着键盘,现代作家浸润于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精神氛围中。或者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大都是遵循后现代主义法令精神的,根据这一法令,表面上我们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实际上我们同样墨守成规。在其中,那种不受阻碍地利用流行的写作规则的权利,就被冒充为言论自由。也正是在其中,所有关于重要事情的真理都是特别地以“轻佻”“文饰”或“挑逗”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写作不是面向种种制度的根本改变,而只是针对改变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流行规则。就哲学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关系做的流行思考,大都只是外在于或者先于书写它们的言语或修辞而得到处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赋予写作以新的意义,并将符号的概念从其根深蒂固的表达主义的枷锁中连根拔起的原因。后现代主义作者的意见使文字游戏甚为流行。

三、哲学探究的自由与政治国家的关系

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启蒙思想认为,社会的真理、国家的真理不应由国家本身来掌握,而应由整个国民来把持。国民是自身利益和知识的最佳判断者,社会是自己真理的持有者。用公民社会反对国家,

是一种被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理论利用的题目。马克思揭示了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因果关系。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状态下,马克思认为,不管怎样,都不能将国家视为超越现实利益对立的東西。从国家理由角度看,国家制度对人的思想进行限制、从而对言论自由以及写作活动进行限制不应只被当作非辩证的陈规使然。而从自由本质上讲,这种用法律或规章制度干预思想的目的不应当是阻碍事物本身,而是应当让事物本身自然调节自己的运作。马克思说,人的行为要“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2](P176)。正确的政治倾向和进步的写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处于这种规律的依赖性中。但实际的法律为什么要“强迫人成为自由人”呢?依马克思所看,这当然只有客观标准消失时才会出现。同时,专横的审查制度除了将作者强加于它的组织形式之外,拒绝任何别的组织形式。因此,书报审查制度乃出于“任性”,它致使自由的科学研究无能为力。

但是,这是因为科学研究本身不够强大吗?当然不是!马克思认为,哲学的政治或社会地位造成了关键的难题:在马克思时代,普鲁士国家的文教制度不能满足“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因为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独立思考。从此方面说,科学研究和探究的自由也就不可能遵从“勇敢的自由精神”^[6](P112)。这里,在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批评所引起的各种思考之中,有一点他是肯定的:不能把言论自由看作所谓一般批评的自由。换言之,如果马克思要捍卫的言论自由仅仅出于为作家这一特殊群体服务,还不至于对普鲁士国家构成什么离经叛道的影响。因为当作家“受行业自由的规律支配”^[2](P193)时,他们最终会为个人和民族的利己目的服务。

依马克思的看法,批评在书报检查制度下成为一种教授的、新闻记者的、职业的批评。它促使批评成为一个固定的行业。毫不奇怪,这个行业的影响也根本不可能是革命的影响。因为批评家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为政府出主意的人——“官方作者”^[2](P195)。马克思追问,在书报出版审查领域,出主意的人是什么含义呢?是指理论上了解价值上平等准则而实际上只是听命于特殊等级利益和特权人物意见的人,他们充其量代表某一等级。在变化多端、瞻前顾后的政府意见面前,他们受审查的出版物“遭受外部不自由的惩罚”。马克思预言,在作者是否维护和表达实现人类自由方面,哲学最精髓的东西绝不是批评的附属。相反,马克思恰恰证明,哲学探究的自由不能作为一种行业或职业持存。

至此,共产主义的理论家马克思当然不会把“具有自由精神的”自己理解为某一行当的成员,而是宁愿把自己理解为某一“风格”类型的代表。作为类型,这一风格类型当然处于阶级之间。因而实际的情形就是:“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2](P111)当时德国的官方报纸说,从哲学的观点讨论政治问题是不合适的,应该把在报纸上讨论哲学问题当作一件坏事而禁止它。马克思则反驳说,不应该仅仅一般地讨论哲学的好坏,而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一种政治倾向,不管它显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仅仅在观念上,而不是作为普通人与人民团结在一起,那它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依据马克思的看法,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与政治的斗争已经存在,但像“奥格斯堡报”那样的报纸对此无动于衷。人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深刻和敏锐的哲学家应当始终超越自己的抽象概念的范围,预测世界历史,从世界历史的根本处汲取营养而不是受其限制。这是哲学在19世纪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谁能否认呢?

但它又不能停留于此。因为在普鲁士,报纸还并不是作家手中有用的生产工具,它仍然归属于特权等级。由于报纸一方面在出版领域上讲是最重要的写作阵地,但另一方面这一阵地又在官方手中,所以,作家在明了他的社会条件性的同时,还要面对极其巨大的压力而做斗争。无论如何,马克思这些文章的主题还可以简化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是“第一篇论文”试图阐明的“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2](P167)的现象而引发的深刻思考。实际上,压制自由精神的专权并加于写作的种种限制首要来自所谓政治正确的价值观。政府垄断真理就是要占有批评的全部,也就不奇怪了。这意味着政府只听它自己的声音。但马克思说,作家只要有能力对自己的写作及其与物质需要的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彻底思考,他们就不会将政府支持的观点完全接受为真。政治正确的倾向是作品

的组织功能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作品的组织功能还要求写作者有真知灼见,或者反过来说,我写作不是只为了让我面向的阶级满意并被阶级接受、采纳。只有真理的裁判官才会说,“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2](P113),结果书报检查制度就制订出一种仿佛有制动装置的关于写作的规则。这些规则就像规范“还没有学会”独立行走的“小孩的理智”一样约束着作者。这时,作品一定就是以被机构的使用为指针的。

作为哲学家,马克思不无屈辱地感到真正的批评苦于书报检查制度久已。他最痛恨“那些想用外来的特权来保护自己并使自己受人敬畏的‘不够资格的’人”;特别是由于缺乏一种真正的批评中的创造,“作者可以说就是书报检查官的秘书”,“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同时是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2](P196,167,113)。从此看来,这种行业写作是怎样在现代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可见一斑。马克思深信,这样的哲学是必然为民众所怀疑、痛恨的。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来看,德国哲学不过就是一个秘书、一个推测上司意旨的秘书、一个每天都要进行“八卦”的秘书的哲学。而马克思,大家知道,他绝不希望阅读印在这样的报纸上的文章,马克思绝不因自己写的哲学被刊登在这样的报纸而感到荣耀,马克思宁可希望拥有那个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读者,甚至他的写作根本不是为了出版。我们可以用这些《莱茵报》文章作为样板设想,马克思,只有马克思才能认识到,自我封闭能够导致一个人的毁灭,因其不愿公开的斗争,说出那些话的报纸也是注定趋向毁灭。

但可惜的是,在普鲁士,写作活动的流行潜规则太多了。它变得越来越严苛,结果是在针砭时弊时不可能不对“柏林的蛋”进行美化,且不说,一个臣民希望投书于一项民意调查,批评在今天国家的治理是否是最好的,权力部门肯定会发怒。它甚至成功地使它以合乎时宜而完美的方式所理解的普通人的苦难成为欣赏对象。马克思问:这样的写作究竟对谁有用呢?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自然没有好的批评。恰恰相反,在批评的发展中,它会“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如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2](P172)。这样一来,好的批评既不可能在行业自由处完成,也几乎不可能被官方报纸包含。当虚伪自由主义说作者和检查官之间有机统一的时候,马克思从中看到的却是:书报检查官行业的脾气和作者行业的风格越来越强的形式主义。在此情形中,马克思断言,作者既要努力用自己的风格去写,又要努力顺从检查官用“管理精神”的手把作者自己的风格碾成粉末;对作者来说,这“令人欣慰”的统一不过就是一种“同病相怜的职业需要”,而不是他们创造力的自然表现。假如作者写作只是为了让检查官做出仲裁,让检查官批评,可是,这些检查官却并不写,那么,他们的批评必然丧失基础。原因在于,他们制造了作者与人民的对立。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欣赏吗?不,是求疵,是发号施令。马克思形象地说,他们不写怎么能进行批评呢?呵呵!他们用脚和嘴,但“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头脑——才成为人的手脚”^[2](P188)。

进一步说,“书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则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2](P133),这是一种滑稽的状态,它把对傲慢无礼检查官的赞美代替为对现实的批评。马克思为此预言,在将来,从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教授的、新闻记者的和自由主义的写作出现的必定是另外一种写作。在将来,是什么样的写作呢?马克思称之为“幸福的写作”：“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東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2](P134-135)如果这就是幸福的写作,那么,哲学以及关于哲学谈论幸福和写作,不意味着谈论哲学本身就是产生幸福的基础;更确切地说,为幸福计,或者说是为人之自由的本质计,仅仅哲学本身是不足以把人们引向幸福的。虽然哲学对人类幸福的增减有所影响,但要确定人类的幸福,就要为哲学和亲善于哲学的政治国家联盟。依据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在哲学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方面所谈的一切,同时也说明了政治国家与人类精神自由的关系,说

明了作者获得更多现实的自由同最适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也插入了一个中间环节——像书报检查官那样的官僚阶级。

四、马克思对学术写作规则流弊的本质揭示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是将外在于政治的东西添加到政治中,而是以政治事物内在本性的方式研究政治问题。因此,“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21](P226)。马克思以此标准来评价现代哲学的正确与荒谬,其正确之处在于它们把政治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从经验和理性出发,“国家的自然规律”也由此被发现了;其荒谬之处则在于,哲学对政治的批判不足。

举个例子来说。人们今天经常谈到黑格尔的著作是晦涩难懂的,这种晦涩也可以被视为政治批判不足,以及书报检查制度或者迫害使然。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把自己的观点藏匿得足够深,从政治上看,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从哲学上看,黑格尔不厌其烦地在书中以断言“S是P”、又断言“S不是P”的表述方式隐藏起革命,就像“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哲学命题一样,将这种哲学表述应用于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形成了黑格尔关于学术写作的潜规则。这就是说,在书报检查制度是必然的时候这种哲学的写作特征才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黑格尔晦涩言词的背后终究是要批评普鲁士恶政,那么,恶政的继续存在,只能从普鲁士臣民的相应的墨守成规和畏首畏尾中找到理由和解释。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之所以用一种特殊的表述或写作技巧,“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7](P227)。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要求黑格尔用显白的证据或言词来进行政治斗争。显然,这样的证据或言词对黑格尔哲学而言是不可能近在咫尺的。根据黑格尔的看法,书报检查制度压制出版物是民众心智未开及其维护“政局”的必要。他深信自己的著作之使用晦涩言词是为了“避免违忤上意的任何事端”;可是,在此方面,“这位哲学家并不知道陷报纸于横祸的真正原因”。据说,黑格尔在《班堡报》担任编辑和新闻记者,整整度过21个月,“连一篇理论著作也没有写出来”。在这些岁月里,黑格尔的学术才能到哪儿去了?应当说,黑格尔用他自己头脑里的体系结构压倒了原本水平不高的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要求^[8](P58-64)。因此,黑格尔哲学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在书报检查令下,若在这种黑格尔个人胆怯的人格和这种哲学作品的保守意义上期待更新,那是普鲁士政治的特权,因而,黑格尔哲学离“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7](P220)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可见,从黑格尔哲学的例子上看,哲学化的自由遇到阻碍时,哲学的政治或社会地位通常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哲学及其解体的这一学术写作的潜规则细节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更重要的是:在“写和说”属于“机械的技能”^[21](P185)时代、也是心智被体制化的时代,哲学应当承担起促进理智氛围的根本性革命变化,坚持将对学术写作规则与一种现实的自由精神唤起联结起来。马克思为此强调,人类精神、心智体制化所具有的危害是我们的时代所应当明察的。在黑格尔对世界的实际态度中,对“存在着的东西”的合理化超过了对“现实的东西”的批判。一方面,他的现实感以及哲学家的“头脑”,飞离这个世界,这背离了人类精神成熟的理性批判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黑格尔所谓的哲学“教养”乃是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流行规训,是一整套阻碍自由的心智和精神的顽固关卡。所以,近视的官方当局认为,黑格尔的上述命题是在哲学上为书报检查等制度祝福。而书报检查令一开始就不认可“正在世界化的”哲学。因为“世界化的”哲学涵括了种种现实的要求。根本上说,“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21](P222)。这时,如果一定的作品必须以党派意见来确保在哲学上捍卫探究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以这种方式捍卫探究的自由叫作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马克思认为,那被哲学称为思想自由的东西等同于实践一种能力,甚至为所

有的实践目的计也必须包括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正确批判的能力。所以,哲学不是什么党派的喉舌,哲学也不使人民成为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马克思认为,必须把哲学家理解为促进精神生产的社会化的代表。马克思看到了在生产过程自身中将精神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途径。从这一意义看,马克思哲学犹如给19世纪“突然”带来“一次空前未有的破坏活动”,它的作用犹如思想烈火那样猛烈。但像马克思这样清楚认识到自己理论使命的人极少。人们通常也不太能够分清好、坏报刊,分清对国家有利的、揭露真相的话和谄媚、有害的话。但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相应,马克思几乎只是为中国人民写作。人民也渴望了解国家本身,人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或适应于一个由政府不断宣称的真理陈述。由于哲学只为面向中国人民,所以“有些半官方的文章威胁说,要由官署出面给哲学规定一个合法模式”^[2](P221),所得出的结果是:哲学不是通过真理而发展,而仅仅是在它的严格的习惯性的遵从过程、通过卑躬屈膝和规训而延续。

这里论及的问题本质上在于哲学以什么规则标准对现存事物进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法律国家不同于警察国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基于捍卫人类的最高利益,它符合“真正的法律”而非“形式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的规范性质不取决于作为个人或集体的观察者(例如莱茵省议员)怎么看。这里,马克思使用了“自由的自然规律”^[2](P176),这一表述意味着他倾向自由的自然法立场,同样他还主张作为观察上与心智无关性的客观性。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学术写作的潜规则有着老练的洞察。他谈到,不是以书、报的厚薄当成评论它们之为“学术性的”标准,而应该是以勇气直面“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2](P203)。照马克思的说法:好坏报刊的评判标准,本质上不应该是党派意见用来党同伐异的工具,而应该是自由的充分体现。马克思看到,总是不断有“社论”被写出来,似乎有一个坚固不可动摇的阵地提供党派使用,而实际上,它们提供的是一个人与之同道的政党阵线,而且也是在其同行、同党、并肩战斗以及有时甚至一同被对方俘虏的阵线。书报检查官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占有一个国家机器,实际上是国家机器占有着他们。这部国家机器不再是生产者的生产工具,而是已经变成对付和压迫生产者的工具。故此,马克思对之反思,并找到了一种关于什么是“够格的”学术标准的東西。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一个学术作品要想存在,它的规范就必须在强意义的观察上与独立思考相关。在这个方面,它的规范如同与小学老师教人作文的规范——“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一样。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角度看,任何生产者都可以说任何话,而不是“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2](P199)。

马克思坚定地坦承,附属于检查制度的写作规范虽然有权威却无所谓神圣。因为政府的法令本身是变化的。它完全可能将自身降格为朝令夕改的交战各方的利益争吵。就客观的批评这个方面而言,人们大概也只有这样来领会才会对学术研究和写作怀有正确政治观以及尊重。对马克思而言,同样重要的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写作是作者个人表达其精神的普遍方式。如果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迫使作者以隐微的方式写作,即对不同的读者说不同的东西,那么,这一点正是把作者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宁愿将隐微写作和阅读看做是武断的著述和猜书,而将之弃绝。显然,如果书报检查官的努力是促进体制规范的心智方面的自由运作,他们就不应做任何有可能损益这些规范在观察上与心智无关的事情。但是,他们之行业的偏见却恰恰将自由视为偶然的例外而非常规。因此,马克思说,“如果在涉及自由的特殊存在时,认为这是特殊问题,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这是特殊领域内的一般问题。自由终归是自由。无论它表现在油墨上、土地上、信仰上或是政治会议上”^[2](P201)。

显然,马克思让我们看到:写作孰优孰劣,其标准只能是自由自身决定,而不能根据自由之外的因素例如特权势力、感性知觉、计数统计等来决定,不然的话,就会像书报检查条件下写文章谈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一样,唯权威性原则是从,使它成为学术写作的流行规则,这与检查官只能停留在他所附属的特殊利益的立场是一样的。马克思在批评这种态度之际最强调的一点是:一旦谁想以完全独立于思想习惯的自由意识来从事写作,他就要自觉地承担起批判思想专制的责任。因此,只要有哲学的自由探

究,也就否弃了那种总想强化自己的剥夺性影响的学阀,以及在实质上遵从特权得势的学术潜规则。马克思认为,只要哲学化自由存在,哲学就将扩大影响,“进入沙龙、教士的书房、报纸的编辑室和朝廷的候见厅,进入同时代人的爱与憎。哲学是被它的敌人的叫喊声引进世界的”^[12](P220)。这就是说,在19世纪初,哲学从反抗官方理性用特殊外在的标准确立起写作规训里意识到自身自由的巨大源泉。这源泉就是人民。在哲学发展中,“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2](P195-196)。

和前面这些说法略微不同的是,哲学家面对官方式的批评,观点的辩护就显得是一项很困难的学术工作。因为如果哲学家指明了这些观点中哪些观点既是高贵的又是虚假的,哪些又是更高贵的真理,那就相当于引入一种无聊的、引人误解的权威性原则。马克思相信,只要有言语交流的地方,就会使哲学论坛沦为一种政治会议。故此,对哲学化自由来说,权威性原则大体等同于有倾向性的、无自由启发性的原则。而作为一种法律的书报检查制度在客观上与心智优劣无关。反过来说,倘若尚未作自由探究之前,就立场或规范先行,或者仅仅讲一些貌似真理的套话——从别人观点里摘出一种来赞同而为之辩护,那他所做就是多余的。从马克思观点看来,由此“辩论人的幻想的、油滑的、善感的神秘论调变成了冷酷的善于钻营的精明务实,变成了狭隘而庸俗的世故打算”^[12](P173)。

这里关涉的是将正常的学术观点批判澄清变成习惯性的观点辩护,其本身必定会让思想变成“生意”。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评论是:“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品、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19](P142)。这样看来,要是马克思的著述以辩论或论战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结果会如何呢?显而易见,这样一种设想只是预设了现在存在这样一个作为作家的马克思这个人,但实际上,这样的“作家”与他毫不相干。这里涉及本质的问题有:究竟为什么必须这么写?为什么比作家个人的生存更重要的,是他写作的真理目的本身,比作品的生存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或别人都不应被当做一种生产工具?马克思对哲学自由探究的力量之深刻理解正处于这些难题的方向上^[3](P54)。

五、结语

在国际思想界,马克思磨砺出来用于捍卫写作和出版自由的是一把“利剑”^[3](P53)。它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具有特殊回响。我们知道,21世纪,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写作或心智受到学术规训是被欣赏的,而写作不被规训则几乎成为笑柄。在过去,一部作品的正确的政治倾向与它的学术质量标准混淆在一起,如果人们表达的是宗教和哲学观点,那他们往往是“把公开的斗争变为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力量的力量之间的斗争”^[2](P172)。而在当代,“哲学以及关于哲学的谈论和写作几乎成了礼貌”^[10](P1)。当哲学家感到有责任去奉献真知灼见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还被时代诸多对立的世界观激励,还有种种为他们自己的心智体制化的现实态度和偏见所困扰。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大都能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那么我们或许早就失去了与马克思真正交谈的可能性,失去了像马克思那样愿意或者说能够忍受彻底思考所具有的危险和艰苦的劳作的的能力。因为,包围着我们的是“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不变的利己的利益”^[2](P144,187)。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资格连同写作水平表现为非常卑劣。

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已经说得够多了,但在这里说,有可能更能够使我们直接领略。马克思的锥心之言业已写在下面:“鞋匠雅科布·伯麦是一位大哲学家。一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不过是一些大鞋匠而已。”^[2](P194)这说得很清楚:马克思批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等等以及大学的平庸作者们”。马克思奉劝他们:还是当个“泥瓦匠、木匠、建筑师”为好。因为,从物质的和象征力量的对比关系看,那些所谓“够资格的作者”^[2](P196,197)写的书,不久便没有任何人再读了,但是100年以后呢?子孙后代却会不断念想起作为“泥瓦匠、木匠、建筑师”的好处,住在他们建造的房屋里。这里看待

问题的实质在于,不仅要理解人类自由精神的富矿和母体,而且要理解人类自由的创造所包含的人民理性和新生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比理解作家当做人民的“秘书”更难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 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 刘成富、陈玥、陈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弗·梅林. 马克思传. 樊集、持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4] 奥·科尔纽. 一八四八年革命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阿尔森·古留加. 黑格尔传. 刘半九、伯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马丁·海德格尔. 论哲学的规定. 孙周兴、高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The Criticism of Academic Writing Rules In Marx's Early Political Articles

Zhang Wenx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Providing freedoms of thought, expression and publication for all philosophers and scholars has been a mythology of human rights that the Enlightenment and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of freedom have been dreaming about but never bringing about. One obvious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lash of ideas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stitution also see as its enemies ideas and people capable of critical ideas. The censorship of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disciplines on writing is the way for the institution to cope with its enemies. Marx's criticism of Prussian censorship, in fact, is the criticism of the institution. The main idea of this task is contained not only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but also in the criticism of academic writing rules. Taking "the natural law of freedom" as a starting point, Marx refuted the censorship and made writers megaphones of truth and freedom of speech by criticizing the grammar and expression of thoughts and the hidden rules of writing. Through his criticism of the censorship, we may well understand why Marx's most philosophically passionate works appear to be "political".

Key words Marx; censorship of publications; criticism of institution; academic writing rules

■ 收稿日期 2022-05-31

■ 作者简介 张文喜, 哲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